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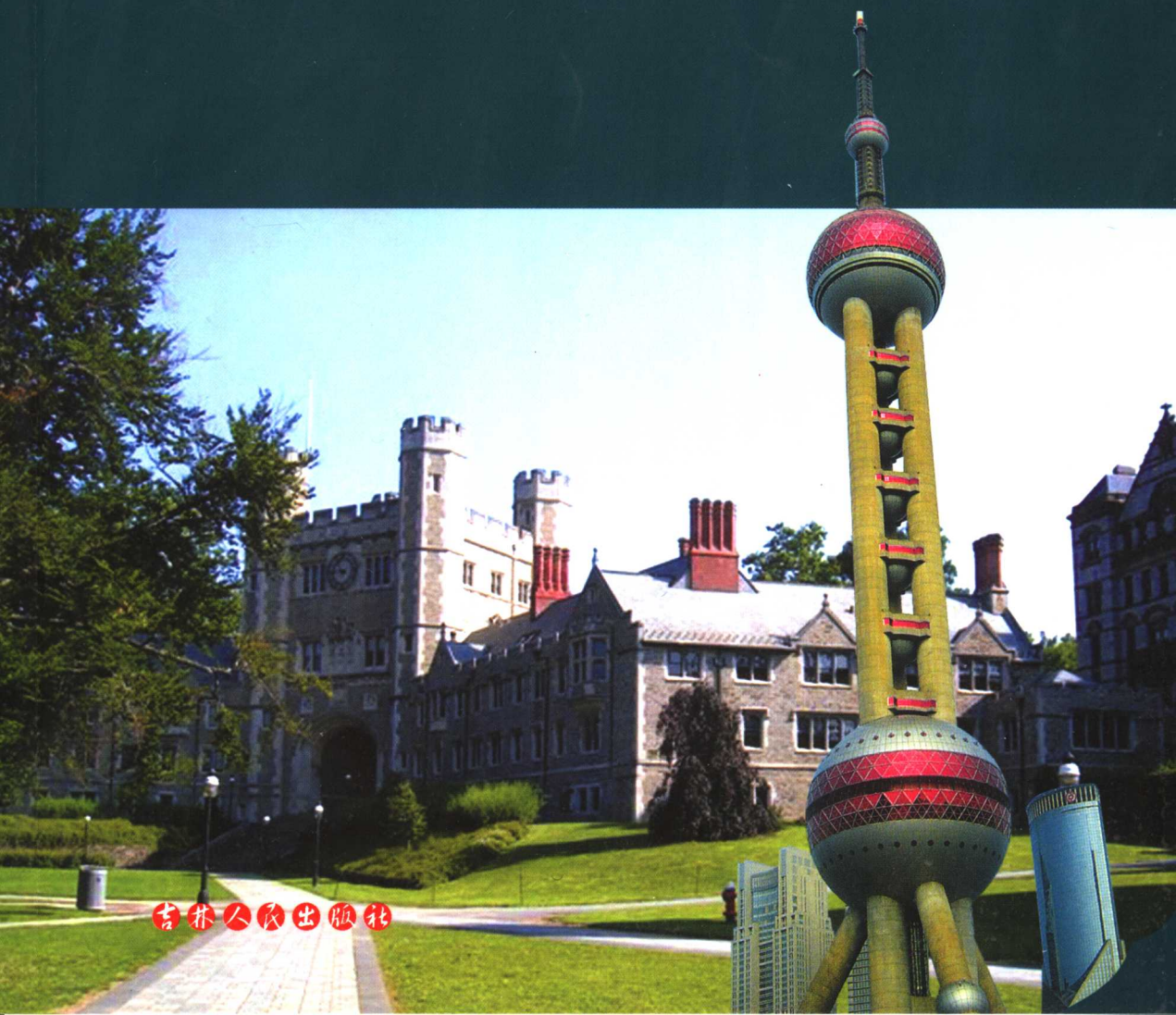
J

JIAOYU JINGJIXUE ZHUANTI
JIAOYU JINGJI SIXIANG YU JIAOYU JINGJI XIETIAO WENTI YANJIU

惠 圣 黄育云 编著

教育经济学专题

——教育经济思想与教育经济协调问题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惠 圣 黄育云 编著

教育经济学专题 ——教育经济思想与教育经济协调问题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经济学专题:教育经济思想与教育经济协调问题研究/惠圣,黄育云编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10

ISBN 7-206-04598-7

I. 教… II. ①惠…②黄… III. 教育经济学-研究 IV. G40-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7502 号

教育经济学专题——教育经济思想与教育经济协调问题研究

编 者:惠 圣 黄育云

责任编辑:隋 军 封面设计:马继东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电 话:0431-85378017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4.375 字 数:57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598-7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册 定 价: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宏观上表现为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微观上表现为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因此,作为研究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教育经济学分为宏观教育经济学和微观教育经济学两部分:宏观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教育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解决教育与经济的协调问题,为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一定理论依据;微观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教育产业领域自身的经济现象及规律,解决教育经济管理问题,对教育资源配置提供有效的实施办法。本书紧紧围绕教育经济学研究领域为这两个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教育如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既注意深入研究有关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又把眼光投向新的领域,从较宽广的视野来研究教育经济问题,用一些新的概念、原则,在更高层次上对现有理论进行综合概括,力求给教育经济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理念、新思路,同时紧密关注新世纪教育与经济改革现实,力求为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出谋划策,为解决现实教育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1. 关于教育经济协调问题研究的历史沿革。

一门科学只有扎根于自己的历史,才有深厚的根基。本书首先对教育经济协调问题的研究历程进行了深入探讨。

教育和经济发展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人们对教育经济协调问题的认识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在传递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反映原始社会把教育、生产、生活融为一体的极为朴素的教育经济思想。古代学校教育虽然突出其政治功能,但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教育与经济的联系必然通过政治而表现出来,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发展教育是使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条件之一。漫长的封建时期,西方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教育经济思想意识像其他科学思想一样,被长期禁锢、压抑;唯有中国,几度政治强盛、经济繁荣,使教育经济思想意识得到继承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古典教育经济思想体系。

大工业的发展,使人们对教育经济意义的认识,从现象的直接描述开始过渡到理论的抽象和本质的揭示阶段,经济学家们对教育经济效益问题日益重视。1924年前苏联斯特鲁米林发表《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一文,运用经济观点和数理方法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被认为是现代教育经济研究的开端。中国古棣最早提出“教育经济学”概念,首次提出“教育之经济学”的科学名称和学科内容的基本构想,是世界上第一个讲教育与经济课程的教授,在教育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古棣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教育之经济观》一书,用经济观点充分阐述了中国的教育问题,其蕴含的一系列教育经济思想,已经触及到了教育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重大问题。

20世纪,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全球范围内被引起高度的重视,教育由滞后跨

入超前发展，并由此诞生教育经济学。美国舒尔茨、英国维泽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为现代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作用。这一理论顺应了许多国家倾力促成其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从而使教育规模扩张之风盛行。但是，教育扩张与经济的不景气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明显的“失灵”，从而催生了各种反主流派的教育经济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非人力资本理论试图从新的视角，采用新的方法，探讨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教育与个人收入的关系，修正人力资本理论，进而对困扰人力资本理论的难题做出自己的回答。但事实上，这些新的理论并没有推翻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

共产主义领袖们的教育经济思想似乎更高一筹。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述教育与劳动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指明了教育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客观作用，揭示了教育经济学的根本理论问题。列宁的博大理论中不仅有丰富的教育经济思想，而且蕴含着光照千秋的方法论启示。邓小平的教育经济思想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风格：从大局上讲教育经济，从政治角度谈教育经济，从国际局势发展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论述教育经济，从历史现实及未来贯通的交汇点思考教育经济，其教育经济思想是一种宏观经济思想，尤其是“科教兴国”思想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人力资本学说。

随着教育经济研究的发展，勃兴于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经济主义思潮迅速波及世界，它把经济需要作为审视教育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或影响了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经济化弊端的显现，随着道德水准降低和人文精神的跌落，对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批评与日俱增，但它仍以难以抗拒的影响力左右着国家、社会及个人的价值取向。

2. 关于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教育经济协调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教育是以人的发展为目标的一种社会活动，经济是以利益或效用的增进为目标的一种社会活动，二者同为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社会“物”的基础，教育发展是社会“人”的基础；经济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基础，也是以满足“人”的发展为目的，“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动力；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和物质保证，教育是经济发展的能源和支柱，作为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二者发展如不协调，不仅两败俱伤，而且也会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如何使两者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的局面，自然就成为宏观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在一定条件下，教育与经济的功能是互相转化的。譬如，经济的社会功能，从教育角度看，主要表现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使人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的劳动生产力，这可以称之为经济的教育功能；教育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提高个人和民族的素质，而人的素质（包括智力和思想品质）的提高，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条件，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可以称之为教育的经济功能。因此，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就必须综合地看待和认识教育与经济。

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

的基础。因此,首先是经济发展决定教育发展;其次教育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支柱和能源。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方面,经济发展为教育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越来越雄厚,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教育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强度也越来越大。教育作为一种永恒的社会存在,并不是完全消极地为社会经济所决定和制约,教育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并随着历史的推进而愈益突出地显现。没有哪个社会像今天如此地重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不讲经济的教育不是现代教育。随着现代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化趋势,教育既贯穿于社会经济的全过程,又顺应着社会经济知识化的潮流,逐渐与经济融合为一体,成为经济活动的先导。经济教育化与教育经济化同时发生,教育的生产与再生产转变或加入经济过程与活动,使教育的经济功能得以扩张。

教育的经济功能更主要地体现在其对非正规约束的作用上。非正规约束维系着人们生活实际的大部分空间,可以大幅度地减少交易成本,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意味着教育必须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长远进步。一个社会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非正规约束的变更和改善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教育的长远使命是通过引导个人的价值取向,促成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和精神状况的变更和改善,而非仅仅致力于追求一些功利性的短期目标。对于像我国这样一个通常将价值取向的信念伦理置于首要地位的民族来说,非正规约束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极为深刻。我们应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渗透和引导,避免就经济谈经济功能的局限。在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维持公共生活的空间秩序,创造合理、高效、公正、有序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本依据,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因此,在处理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时,既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实事求是地追加教育投资,发展教育事业,又要克服只顾眼前短期经济利益,忽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性、迟效性作用的观点,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果不讲在一定的条件下,或在特定意义上,片面强调某一方面,都是违背经济与教育之间辩证发展客观规律的。

3. 关于经济与教育的运行机制

经济与教育的运行,是指经济系统和教育系统,以实现各自的目标为出发点和归结点而分别开展的有意识、有组织、有秩序、有规律的运动过程。经济和教育运行机制,包含目标、动力、信息和调控四个子系统,保证教育与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运动过程得以延续、增益和扩展,在教育与经济在其结构相互适应的基础上,做到其发展目标 and 动力一致,通过信息的畅通传递而实现的行为“默契”,同时还有相应的调控体系能对教育与经济双方产生必要的约束。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是指在现代社会大系统中,教育和经济两个子系统之间,由于结构相互适应,运行相互协调,从而出现的相互促进、优化发展的运动过程。为了保证经济正常发展,社会必须把发展经济的收益中的一部分,对教育作适度投入,使教育得到适度发展,教育的适度发展又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需的人力资源保证,从宏观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看,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其实质就是教育的适度发展。二战后,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教育在

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显著。于是,各国都把实现教育与经济的良性运行,作为刻意追求的战略目标。

社会大系统中的教育和经济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只能建立在两个子系统的结构相互适应的基础之上。

所谓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适应,主要是指教育结构适应经济结构的需要,而不是它们之间的相互适应。也就是指教育结构能够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能够充分发挥教育的经济效益。但是,经济结构本身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本身就不能发挥人员与设备应有的经济效益,是阻碍生产发展的,需要调整与改革。因此,合理的教育结构,既要适应现有的合理经济结构,也要适应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革趋势。因此,教育结构对经济结构的适应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教育结构对经济结构的适应,是就合理的经济结构而言的,即使对合理的经济结构的适应,也只能是相对的。因为所谓合理的经济结构,也是就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相对而言的。一般来说,只要能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使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按良性循环运转,比较充分有效地发挥国力的优势,这样的经济结构,就是合理的经济结构。而对这种合理经济结构中的千行百业,教育所培养造就的专业人才和合格劳动力,只能从基础(包括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方面适应各生产部门的基本要求,而且经济还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合理的教育结构,即使已经通过科学的预测而基本上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仍然需要不断地调整和改革,从而不断适应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要求。因此,对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适应,必须从动态的、相对的、基本的方面去认识。

实现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不仅需要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适应,而且需要教育与经济的运行机制相协调。有计划地改革教育运行机制,便成为我国实现教育与经济发展良性运行的关键所在。政府对教育的职能主要是引导和服务。宏观管理主要实施的方式是引导,服务的实质在于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证和政策环境。过去教育发展受到挫折的最大问题,都是由于宏观决策和调控失误造成的。只有做到政府的教育行为合理化才可能实现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

由于教育与经济之间存在内在必然联系,通过教育预测和规划促进教育与经济运行的协调成了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资源配置主要由市场调节还是由政府直接决定,这是计划经济下的计划和市场经济下的规划的一个根本区别。规划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具体活动不具有约束力。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建立在对市场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的。在2005年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由计划向规划转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又一个历史坐标,必将促进教育规划的迅速发展。

4. 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实现

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在于教育经济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要追求教育价值,个人、家庭和社会投资于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追求教育的经济价值。

传统教育更多的体现着政治、文化方面的价值,经济分析一直没有真正介入教育。虽然早就有人从理论上论证了教育经济价值的存在,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人力资本理论才通过精密的实证分析证实教育投资对个人收入的增加、对社会经济增长、社

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人力资本理论也力图从微观上分析教育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揭示教育经济价值是如何实现的。

经济学的发展为我们全面认识教育的经济价值实现的机制打下了基础。依据劳动价值理论，劳动者的知识、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在单位时间内使一定的活劳动形成更多的物化劳动，生产较多的产品，从而使单位产品的价值下降，达成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教育——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这个因果链条中，可以明显看出教育的经济价值。尤其对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的现代经济增长来说，教育投资的经济价值比单纯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投入所产生的经济价值要高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增长理论视知识为经济系统内部变量，把知识直接引入生产函数，认为知识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有收益递增的特征，强调知识的溢出效应。这种对知识和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的探索，有助于我们认识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知识发挥着巨大的推动力，同时由于教育是知识传递以及将知识固化在人身上将之转化为人力资本的主要工具，教育经济价值的获得与增长是与知识的储量保持一致的。由于知识价值的体现必须以一定的知识量的积累为前提，因此教育的经济价值不论是对宏观经济增长还是个体经济促进也必须依靠知识的储量以及应用知识的环境与条件。对于受教育个体来说，与教育在宏观经济增长中的过程相类似，只有受教育个体中人力资本的存量得以使得个体得到的物质资本的增长超过个体因自然成长所需物质的增长时，储存在受教育个人中的人力资本才能与个体拥有的物质资本进行“对结”，体现人力资本的使用价值与表现出教育较高的收益率与经济价值。

生产者知识的积累、获得、创新能力基本上是由教育所提供的。因此从生产过程来考察，教育参与了生产的全过程，教育也必然要参与分配。由于生产的知识化和知识化的生产，分配将不仅仅是按劳分配，而更多地是按知分配。一方面知识经济说到底还是科技经济与教育经济。作为一种知识密集型、智慧密集型的经济，它既是基于教育的相对发达，又是基于知识的传播、创新。另一方面，教育经济是高度知识化、信息化的经济，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教育经济的发展引发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对就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教育本身的资本化，受教育者的教育程度与其将来的收益有关，教育经济是教育经济化和经济教育化两种趋势互动的结果，其源头是教育，是创新知识、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教育经济具有强烈的渗透性、扩散性，它在自身已经知识化、信息化的同时，又改造着传统产业的面貌，使传统产业也实现知识化，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知识化。当知识可以增值、知识可以成为财富时，教育便成为一种产业，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发达国家，教育产业已成为“无烟工业”，是支柱产业、创汇产业。教育是产业，就要善于经营，取得更多的产业利润。目前，许多国家纷纷开拓教育的国际市场。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作为一项主要的生产要素进入到生产过程，作为一种知识资本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利益。随着教育、信息、知识在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日益凸现，教育在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意义，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居于先导性地位。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是知识生产、传播、运用的巨大产业，教育产业是代表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模式。从知识经济大系统来看，教育经济是核心。

现代社会,资本的概念不断拓展,教育已成为重要的资本。教育是有价值的,是无形知识资本产生、积累的资源。教育还可以作为知识性的要素渗透到其他资本要素中,从而导致资本总量增大、总水平及增殖能力提高。在资本运行中,教育也可以促使可变资本发生质的变化。经济的教育化与教育的经济化最终使经济与教育、教育与经济融为一体,这就是教育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经济将成为知识经济中的核心经济或主导性经济,教育经济同知识经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教育势必成为21世纪最大的产业,教育将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教育经济化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十六届五中全会认为,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科教兴国战略是在社会发展进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已不再作为重点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新鲜事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年轻的经济学家保罗·罗莫(Paul Romer)提出所谓的“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以深奥的数学公式指出,财富来自人类的想像,财富主要不是拥有更多旧东西,而是拥有全新的东西。“新增长理论”发表十余年,已经成为经济学界及实业界家喻户晓的理论。

教育经济价值源于教育过程中所含知识的存量,而且只有当这一存量达到一定的数额后,个人因教育所获得的人力资本的价值才能抵消因自我成长而带来的消费的增长。因此,个人在较低的受教育阶段,尽管个人为此支付的机会成本较小或几乎没有,但由于这个阶段的教育仅是知识的积累过程,这时形成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外显的经济价值,它只有附着于更高水平的开发与利用才得以体现。

对于高端的教育,受教育者从中得到的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受教育者在其他领域的收益率,是因为高端教育不但自己在创造着教育经济价值,而且还在不断地利用与转化在受教育者身上潜在的教育经济价值。

现代教育既要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又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既要实现教育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又要实现教育与社会经济的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和教育自身的发展,使教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基础产业。“教育产业化”是针对我国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扭曲的历史和社会需要的现实提出来的,其核心是强化教育的生产性,确立教育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其目标是教育产品、教育劳动和教育产权的社会化;其途径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和手段,使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教育产业化”的合理实施必将更好的体现和增强现代教育的经济价值。

5. 关于当代教育与经济协调过程中的焦点问题——就业问题

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惟有实现就业,投入到实际社会生产过程中,才能发挥效益,否则只是潜在的劳动力,不能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从个人收入的角度看,每个有文化的劳动者只有参与工作,才能获得收入。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教育经济研究要阐明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与劳动力供求的关系、教育在解决劳动者就业问题中的作用,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培养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提供理论依据。

扩大就业已成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

从经济角度看,失业或劳动力的闲置本身就是资源的浪费,而且本期可利用的劳动力不能移至下期使用。本期可利用的劳动力的闲置就是这部分资源的永久性浪费。在劳动者失业的同时,生产设备以及其他经济资源也常常会大量的闲置(主要指周期性失业),这会直接降低国民生产总值产出水平。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作为商品而存在。商品在市场流通中,机遇与风险并存,就业风险随着择业自主程度增大而增大,待业和失业与自主择业共生。一个人文化层次越高,抱负越大,职业适应性越强,流动意愿和逐步到位的发展意识也越强烈。因择业产生的待业和失业对整个社会就业机制的改革、竞争上岗带来积极效应,亦为国家经济建设的调整和新兴产业储备人才。

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表现,劳动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必然按市场规律配置,适当失业对社会、家庭和个人既有消极影响,又有积极效应。

几次产业革命都是科技发展的直接结果,伴随着科技水平的更新换代与产业结构的升级替代,结构性失业始终同魔鬼一样,依附于经济发展过程,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摆脱的顽疾。

此后一段时期内,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正在呈现明显的国际化趋势。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有限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全会高扬“以人为本”的大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层面,提出了诸多新的思路。这预示着,“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将从过去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就业、教育、卫生、公共安全等人文和社会指标,正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规划编制者的视野。

经济发展本身将开辟许多新的就业域,总体来说就业机会是增加的。但是随着科技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转为“技术密集型”,由“粗放经营型”转为“集约化经营型”、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使产业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又将使劳动力数量需求下降,就业机会的增长与就业人口增长不能同步,所以岗位不足是突出问题。科技对就业机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对开辟新的就业域无疑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科技的应用、生产效率的提高无疑会缩小活劳动的需求量,从而减少就业机会的提供。数量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并非注定就是就业包袱。如果开发和利用好这些劳动力资源,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那么,未来20年里,我国就可以保持快速、健康、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既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又能最大限度吸纳劳动力就业。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即提高就业者适应工作的能力和转换工作的能力,是解决就业、失业、择业矛盾的关键。

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难度有加大趋势。国家花费大量人财物培养出来的人才都被闲置,无疑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在经济增长愈来愈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当代,大学生的拥有量和结构状况已成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如何有效的使大学生实现就业选择,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模式。也就是说就业选择与就业制度、就业

体制及就业运行机制等密切相关。大学生就业难的缓解和解决要依赖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体制改革和就业运行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6. 关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

社会发展到今天,不论教育的内部还是外部,都与经济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在教育内部存在着许多经济现象。办教育,就要消耗教育资源,就有资源配置问题;教育的投入要讲求经济效益,要精打细算,计算教育成本;劳动需要交换,价值需要补偿,为获取教育服务而付费成为理所当然;教育管理需要引入质量、效率、竞争观念,提高办学效益等等。承认教育内部经济现象的存在,自然就要遵循经济规律办事。如何提高教育的投资效益,须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从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个人诸方面探讨,寻求教育经济管理的规律。

现代社会的一切管理问题几乎都可归结为资源的合理配置。管理的实质是通过有效配置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实现最优化的管理目标。一切经济资源都是稀缺的,而节约教育资源就要提高教育投资的利用效率,必须使教育生产要素有一个合理配置的比例,使之以较优的要素组合方式达到最优化的教育效果;同时,还应有适当的教育规模,在这种教育规模下,教育生产的经济效果达到最优化。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是教育经济管理的主体,在教育资源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在教育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或在不同子系统之间进行分配,以期投入教育的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使用,求得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即如何使有限的教育资源产生尽可能大的效益是贯穿全部教育经济学的主线。教育管理评价的主要指标是办学的质量和效益,没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既无质量保证,又无效益可言。从一定意义上说,教育经济学也可以视为教育资源管理学。

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是否合理。因此,教育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及其与经济体制和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关系,就成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同经济体制下有着不同的教育资源配置的动力源和配置机制。教育资源配置实行的是计划调控与市场导向有机结合的模式,市场导向实质是动力作用,在于微观搞活,使学校充满活力,计划实质是平衡作用,在于宏观调控,保证教育运行的方向及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协调平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运行和调节中起基础作用的是市场而不是计划。计划是在市场基础上的计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教育资源配置,不是不要计划,而是更需要建立在市场信息基础上的计划,需要把政府计划调控与市场导向有机结合,把教育资源配置得更合理。当然,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这种特点只是应然,尚未变为实然。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定义,教育体制是社会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运行机制的载体。教育资源配置是教育政策上的战略选择,它涉及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进行分配。由于各国教育体制不一样,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不尽相同。审视世界各国教育资源的配置,大致可分为政府配置、市场调节和自主配置等三种模式。从实践来看,三种模式都利弊并存,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简单取舍。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导向有机统一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是新的国家追求的目标。这种调控必须重视市场信号所反映的供求关系状况和所提供的反馈信息,而市场导向也要受政府计划导向

的调节制约。市场导向实质是动力作用，在于微观搞活，使学校充满活力，计划导向实质是平衡作用，在于宏观控制，保证教育运行的方向以及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总供给与总需求能协调发展。市场导向主要在微观教育领域发生作用并波及到宏观教育领域。计划导向主要在宏观教育领域发生作用，并制约着微观教育领域。

教育资源宏观配置问题就是教育投资在教育部门和区域间的流向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的发展，一直为投资短缺所困扰，主要是由于国家主渠道不到位，企业缺少投资教育的意愿，个人对教育投入太少所造成的。教育投资供给不足，主要就是指这三个方面的投入不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家、企业团体、教育单位及个人对教育需求都存在着无限膨胀的趋向。这就使本来捉襟见肘的教育投资显得更加短缺。既然我国教育投资短缺是供给不足和需求膨胀共同造成的，那么，缓解投资短缺矛盾的最根本途径是增加供给和抑制需求。增加供给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企业团体和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增加供给的同时，还必须抑制需求。在我国，对教育投资需求的无限膨胀主要是由于人口规模过大，某些政策不当和约束条件的软化所造成的。

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必然阻碍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传统投资理论认为，社会资源总量一定时，教育投资量与社会资源之间存在着一种合理的投资比例。只要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计划预测的科学程度，形成投资决策者正确认识和投资态度，制定较完善的指令计划控制指标体系，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成本，便可增加教育投资量，根除教育投资短缺。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无确定的“合理比例”可循。实践证明教育经费不仅存在着“波动式”的暂时短缺，而且存在着经常性的长期短缺。即使比例合理，由于经济增长的波动，投资环境较差，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教育投资需求的膨胀等使教育投资仍不能摆脱短缺的状态。要摆脱教育投资长期短缺的状态，合理地进行教育投资，必须建立科学的教育投资理论。

改革教育投资体制，不容忽视其代价。在追求效益过程中，引发公平问题。开辟新的收入渠道，扩大收入来源，增加学费，缓解了财政困境，但加高了贫困生入学的门槛，在追求数量过程中忽视了质量问题。任何改革都必然会有代价，这是因为：改革必须耗费人、财、物力；改革常常要以牺牲旧模式中一些好的东西为代价；常会为追求某一价值而牺牲其他价值追求；不同群体承担代价不同，改革措施对某一群体有利但却损害另一群体利益；由于人们在改革中主观认识和决策失误，也会付出代价。代价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正是通过改革来探索、迈向未来之路，人们虽然在改革过程中“再失误”，一再付出代价，但通过代价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我们揭示代价不是要否定改革，目的是展示现实，认识代价，以便更好去发展和完善改革。若看不到代价，把改革理想化，那么，认识就非常偏颇，因此，只有从代价的角度去审视改革，才能采取相关措施最大限度降低代价。

改革是一种利益调整，在改革中不同群体受益程度不同。人们对某项改革的满意度并不取决于改革给他们带来的绝对利益，而主要决定于与其他群体相比较的相对利益，如果相对利益相差悬殊，将会带来极大危害，引起抵制改革情绪。因而教育改革应该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必须充分估计和预定各种代价，并考虑某种后果的净值。如果某项教育改革必须进行，代价付出又不可避免，政府应采取事后补偿措施，如大学实行收费

制配套奖助贷学金等资助制度。

在当今世界上,社会和个人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可用于发展教育的资源十分有限,这几乎成了所有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十分突出的问题。各国教育经费拨款分配方式、监督与管理及学校经费使用均已建立,并不断调整与社会经济和财政体制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从而促进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提高,但教育财政体制及成效仍有局限性,在处理公平与效率,运用教育财政作宏观调控手段,鼓励学校提高办学效益等仍存在问题与矛盾。合理地配置和利用有限的教育财政资源,是跨世纪教育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为此,需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重点和一般、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等几个重大关系问题,做出战略性选择。根据《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要求,通过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投资体制这三项重要的教育体制改革,以转变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从而实现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教育资源,解决好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这个核心问题。

对于教育来说,大多数情况下学生或者其家长关于教育服务的信息知之甚少,学生和学校之间关于教育服务的信息高度不对称,同时教育服务质量的考核和度量非常困难,度量成本很高;再者,即便学生家长发现学校教育质量的问题,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也很高,在这些具体约束条件限制下,为确保举办者不侵害学生利益,公民接受教育,都应是免费或者部分免费的。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理论认为,如果教育只根据市场情况而提供,那么只有付得起学费的人才能上学,这不仅会出现教育投入不足,而且教育会使教育机会不均等带来的收入不均等,世代延续下去,因此,公共教育投入应是教育投资的主渠道,才能保证社会公平和教育机会均等。因为任何公民接受教育都产生很大的外部性,国家和社会从中受益。因此,政府应该承担起教育投资的重要责任。从一个产业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产业提供的产品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或者说产品具有外部性,则整个产业很难产生直接的利润,个人对这个产业的投资很难获得直接的投资回报。或者,如果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来调节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供求,政府不进行投资,整个产业的投资水平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水平。因此,无论何种制度的国家或地区,教育经费的提供国家都承担主要责任,至于政府与私人之间分担比例,由于社会效益很难量化,在理论上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但从世界实践来看,各国政府都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

公共经费是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但日益加急的社会与个人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相结合,促使政府在教育实施时采取了各种成本补偿措施以弥补教育经费之不足。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会给个人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和非经济收益。按“受益者付费”的市场原则,收益率的研究为成本补偿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国家经济和人类的发展来看,人力资本的提高是推动社会经济和人类发展的基础,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政府应是教育投资的主力军;从企事业单位来看,企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创造力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对职工进行培训,以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个人收入的多少与受教育的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个人理应成为教育投资的主要承担者之一。实行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并不是政府的

一项随意政策，而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是随着教育观念的改进、人们投资教育的意愿增强、教育财政日益紧张而出现的。经费紧张是实施教育投资多元化最简单而又适当的理由。

实行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最主要的理论依据是利益获得原则和能力支付原则。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为实现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创造了条件；我国少年抚养指数逐步下降，为实行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提供了现实可能；家长对子女受教育程度期望值升高，为实行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提供了现实动力。

7. 关于教育融资

随着学杂费的快速增长，许多人单凭家庭收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消费力不从容，不得不退出教育消费市场，拓宽居民教育消费的融资渠道十分迫切。现有的教育消费融资渠道不畅，政府的资助政策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教育储蓄限制太多，教育保险由于国民意识的原因只能在小范围内推行，还有学生资助中的学生贷款、其资金来源管理、还款机制等问题都急需研究解决。或出于帮助贫困学生就学，以维护教育社会均等，或出于奖励精英以提高教育效率，学生资助是一种国家行为、社会行为。只要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还存在，只要经济原因还是某些阶层学生入学的障碍，只要人们尚存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理想，对学生的经济资助就是必要的，而且是社会主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我国学校中，采用政府行为给就学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助学金给予困难补助，还采用奖学金、勤工俭学、社会资助等助学方式，但还不能满足需要，必须通过发展助学贷款即学生贷款来解决。学生贷款是当今资助学生的主要形式。为了解决当前贫困生不致因经济困难而失学或辍学问题，教育部要求加大贷款力度，各地高校在学生贷款工作上采取了许多新举措，在具体操作上也有各地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的具体规定。我国实施学生助学贷款时间不长，许多制度还有待完善，操作程序也有待进一步规范，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许多问题须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研究解决。

8. 关于教育产业政策

教育产业政策不仅体现在教育与其他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外部关系上的经济联系，而且也涉及了教育内部所应遵循的经济活动规律，可以使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理解教育与经济的各种联系，把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推向深入。从教育的外部关系上来看，要确定和调整教育部门同其他社会部门的关系，落实教育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的战略位置，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以求实现教育的发展速度、投资规模、质量与效益的综合最优化，发挥教育作为产业的职能，使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从教育内部关系看，教育产业政策有助于认识市场经济的基本活动规律对教育领域可能产生的影响，使教育领域内的经济活动规律得到合理的阐释。社会在发展，教育改革在深入，教育经济活动在不断拓展，教育产业政策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需要不失时机地做出调整和更新，以加强对教育管理实践的指导和控制作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产业政策，但这方面的政策仍然很薄弱。教育经济活动亟待教育产业政策的规范指导。

9. 关于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

现代教育必须讲求效益和效率,以市场的理念来办教育。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潮愈来愈猛烈地冲击着这块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土地。教育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游离在市场之外。市场经济的汹涌澎湃使教育这个被认为最高洁的行业,再也不能“洁身自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改革的浪潮,并以很快的速度急不可耐地冲到了浪尖。市场经济把学校看成一个利益场,教育者是教育服务的生产者、经营者,受教育者是教育服务直接消费者,是接受教育服务的“顾客”,社会、家庭是教育服务的间接消费者,也是“顾客”。教育者、受教育者是直接可见的利益主体,社会、家庭都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实现。教育的事业性特征不断萎缩,产业性特征日益凸现。教育的“市场味”一点也不亚于投身于市场比较早的其他工商企业。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教育远离市场,不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成果的性质变化,是不切实际的;非产业化运行是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发展教育产业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用市场经济的观点看,学生是以付费方式来接受教育服务的,学生作为教育服务消费者理应受到尊重。师生之间商品交换关系气息日渐浓厚,感情色彩趋于淡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生关系格局已一去不复返了。学校教育经济本质是通过教职员工的劳动向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服务,学校的基本功能就是提供教育服务。学校的教育活动是教育服务的“生产”,学生的受教育活动是教育服务的“消费”。学校和教育者为教育服务的供给方,学生、家庭、社会等为教育服务的需求方。教育者向学生、家庭、社会提供教育服务,与演员、医生一样,提供的是服务消费。教师给学生上了一节课,就产生了一节课的教育服务,学生接受了一节课的教育,也就消费了一节课的教育服务。学生向学校交纳学费,社会、家庭进行教育投入,是为了换取教育服务的消费权;学校收取学费,获得社会、家庭的教育投入,就有义务向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这是发生在学校与学生、家庭、社会之间的教育服务商品的“交换”。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学校从育人的场所变成了教育服务的生产机构,学校和学生的关系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管教者和被管教者变为服务者和被服务者、教育服务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是围绕教育服务发生的供求双方的交换关系。

适应教育产业化趋势,我们要确立教育产业观念,打破过去那种一成不变的教育经营模式,引进产业思想和管理模式,借鉴其他产业的经营方法,引入成本、效益、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建立合理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建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机制和研究开发机制,尽快摸索出一套教育产业的商业化经营模式,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发展教育产业。建立多元化教育体系,对于吸收社会游资、增加教育投入意义重大。但这有待于体制上的大动作。当然,在引导教育走向产业化的过程中,应当加强教育监管,打击不法经营,保证教育经营有序运行。

教育产业要走向市场,那么,教育本身必须要有可投身的市场。也就是说,要为教育产业搭建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教育产业可以自由驰骋,大显身手,教育的市场化趋势要求我们积极培养和催生教育市场。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把计划与市场都看作手段,在此基础上,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从此,我国教育界展开了关于“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发展”研究的高潮,

“教育商品化”、“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等观点成为我国教育经济研究领域颇具争议性的热门话题。

在以往的观念中，社会主义教育与商品生产、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伴随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展开的关于“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发展”的研究，表明我国教育理论界已经正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现实经济背景，它使人们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抽象的讨论上，活生生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将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具体化，也使人们对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教育与社会、经济相适应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许多人在论述“教育商品化”、“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等观点时，仍然没有摆脱机械的思维模式的痕迹：当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时，片面地把教育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当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时，又片面地把市场经济理论中的某些概念、术语，把市场经济的模式、运行机制等简单地套用到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来，其结果必然造成教育理论和教育实际工作的混乱。

人们公认，在市场经济建立健全的过程中，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应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反对“……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化”的理解上的机械性，认为，“化”者，彻头彻尾之谓也，教育事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有着自身的规律，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教育都不可能完全“……化”。而实践告诉我们，“化”者，从未有过彻头彻尾之实，古今中外皆然。人们担心，把市场经济的某些活动规律“引进”到教育内部，教育事业还那么“神圣”吗？教育规律还能得到很好地遵循吗？因此，他们对诸如教育产业、教育商品、教育市场这一类带有鲜明市场印记的概念过分敏感。其实，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把教育作为一个产业来对待了，教育产业论在国外早就不是新鲜事物。理直气壮地把教育看成一种产业，把它当作产业来办，就能使教育领域中的经济规律得到尊重。那么，遵循经济规律是否会妨碍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我们把教育看成是产业主要是从它与经济联系的这一视角来说的；无疑，教育还有使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功能，还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这正是教育产业的特殊性的表现。遵循产业规律与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二者不是对立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教育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人们一直不敢正视教育的产业性质，以致使教育的发展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改革中涌现出的许多新鲜的事物，不断丰富着教育作为产业的内涵，因此，在理论上论证和确立教育产业的地位，将对教育发展、教育改革的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教育产业化”就是对传统教育观念的挑战和冲击，它促使人们更新观念，并呼唤人们全方位，多层面，多视角地去思考知识与经济、教育与经济的密切关系，促使人们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际，对整个中国教育改革的宏观、微观问题作深刻探索，如政府与教育主管部门应如何根据教育产业观去管理教育，办教育者自身又如何去完善，要不要学习、借鉴现代企业的管理与经营方法？人为地去排斥这些很现实的问题，只能进入一个理论误区、行为上的“盲区”，而在事实上，只会大大降低教育的社会效益。

作为高等教育产业化发源地的美国，其大学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一的交椅，在全球最

具学术竞争力和权威性。尽管美国高等教育经济化过程中表现出重收益轻学术、厚实用、薄理论的倾向，但总是有限的。大学毕竟最后是由顾客（即：学生、家长、社会公众）从个人或社会收益角度来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教育市场必须维持顾客认为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因为顾客是上帝。而学校的种种经营手段无非是要吸引顾客，吸引优秀学子与师资。当具有非常明显的较高水平的教师们感到自己被小人欺凌或被不可理喻的半吊子轻视的时候，他们或许离开这个鬼地方，领导们将为此付出代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除了在强化公民教育外，更主要的是在于知识的生产和文化的传承。凡勃伦认为，“市场并不是无序的，不仅仅是看不见的手的活动，而是几只手的活动”。

本书由惠圣、黄育云提出编撰框架，惠圣负责全书统稿和审校工作，黄育云作最后审定。参加编撰的人员分工为：前言、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十章，惠圣（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育系）；第三章、第八章，黄浩（西华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第六章，黄育云（西华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第九章，李福华（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育系）；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闫建璋（山西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院）；第十三章，刘兆宇（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教育系）。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吸收了许多同行研究成果，参考和引用了大量资料（能注明的尽量注明，但也可能有疏漏之处）。吉林人民出版社的隋军女士为本书编辑、校对、审稿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们对所有相关人员和单位，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不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切望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编者

2006年12月